

明末清初進入江南地區的耶穌會士（中） ——以郭居靜、衛匡國、潘國光、魯日滿、殷鐸澤為中心

趙殿紅*

摘要 明末清初進入江南地區的歐洲耶穌會士有一百多人，他們多數擁有深厚的歐洲神學哲學教育背景，又不同程度地掌握當時世界先進的科學知識，既是優秀的傳教士，又是淵博的漢學家。與其他修會的傳教士相比，他們注重“知識傳教”“科學傳教”，採取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方式開展傳教工作；與在宮廷效力的傳教士相比，他們又注重在城鄉民眾當中組織傳教網絡。他們是利瑪竇“適應策略”的積極踐行者，為江南地區天主教傳教事業做出了奠基性的成就，為中國歷史上第三次大規模的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傑出貢獻，堪稱天主教史和中西交通史上“巨人的一代”。

關鍵詞 明末清初；江南；天主教；耶穌會士

根據作者統計，從1598年利瑪竇南京開教到1707年教廷特使鐸羅被逐出境，前後110年間，進入江南地區的耶穌會士共有122人，其中葡萄牙籍46人，法國籍22人，意大利籍21人，比利時籍八人，西班牙籍三人，德國籍三人，瑞士籍一人，波蘭籍一人，捷克籍一人，克羅地亞籍一人，中國籍15人。以葡萄牙、法國、意大利傳教士人數最多，而法國耶穌會士進入江南地區，主要是在1683年法國“國王數學家”來華以後。¹可以說，這些傳教士每一位都是耶穌會訓練出來的“教宗連隊”優秀的戰士，他們不辭萬里風濤，穿越關山險阻，奔走於長江中下游平原的城鎮與鄉村，有長達三五年者，亦有長達十幾二十餘年者，甚至逝於斯，葬於斯。本文有限的篇幅無法對他們一一介紹，茲以郭居靜、衛匡國、潘國光、魯日滿、殷鐸澤等為例，對傳教貢獻較為顯著的耶穌會士核心人物加以詳述。

一、郭居靜：明末江南開教先驅

耶穌會在江南地區開教的第一功臣當屬意大利耶穌會士郭居靜。郭居靜，字仰鳳，1560年生於意大利薩匝羅（Sazzano）一個貴族家庭，1594年來華。利瑪竇1600年離開南京北上時，指派郭居靜負責南京教務，居靜後來多次奔走於澳門與南京之間。1606年，他再次受派前往南京。1608年，徐光啟父喪丁憂，由京返滬守制，臨行前同利瑪竇商議，請他派南京的一位神父同赴上海。途經南京時，光啟往謁郭居靜神父，請他前往上海開教。²上海當時已是富庶之地，《徐文定公事實》記曰：

上海城周六里，城外房屋與城內多少相若，戶口約四萬家。上海平地無山，鄉下居民房屋圍繞田間，而村莊多像城市，戶口約二萬家。城內外及鄉村共人數約三十萬人，地丁銀一百五十千金錢，糧米價錢同白銀仿佛，共計金錢三百千。鄉人年歲豐收，米棉均多，織布二十萬匹，上海布通行北京及各省。百姓素來玲瓏巧妙，城裡人更覺秀靈，明悟聰敏，讀書人多，科第益盛，士宦者亦不少。故鮮貧多富，鄉紳宅邸十分體面。³

* 趙殿紅：歷史學博士，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副所長，唐廷樞研究中心研究員。

上海地區人口密集，經濟富裕，讀書人和士宦者眾，民人素質較高，且距離南京較近，是傳教士們嚮往已久的理想之地。郭居靜到達上海後，住在徐光啟位於上海城南門內喬家浜南岸的九間樓住宅，先是為徐光啟全家大小及僕人都施了洗禮，吸引了城中不少名人士宦前來訪問。為了方便傳教，徐光啟將郭居靜安置在南門外名為“桑園”的朋友住宅。郭居靜在桑園寄寓兩月，為五十多人舉行了洗禮。稍後，徐光啟又在城內購得房屋一所，將其辟為上海城中的第一座教堂。⁴《徐文定公事實》記載了郭居靜在上海傳教的細節：

郭鐸德在徐保祿家三日，彼此道安，問慰親密逾恒情，地方官府並鄉宦人家，均來拜謁。郭公向徐公說，此間不能常住，常住在此，恐難廣揚聖教，是何緣故？因為你是富貴人家，只有紳士可以進來聽道理，彼貧賤鄉民，深恐未能擅入聽講，所以極當預備不拘何人容易進出地方。乃在城外擇一所房屋，本是散心地方，自神父居住，即作用心地方，惟來往人眾，房屋狹小，不敷所用。其時神父頗忙，不特無祭彌撒念經時刻，就是散心安息時刻亦一點沒有，往往延至深夜，如此用心，自然能救得靈魂。……先是，上海縣屢來見鐸德，城中人多說他要想奉天主聖教，雖不曾進教，但已有一句傳言。……蓋有一新教友發寒熱，而其兒子亦同時發病，乃來求神父送苦像，豈知聖像方到，二人之病登時全愈。……有一家新娶婦，被惡魔磨難，一刻不能睡，一點不要吃，說話兼魔鬼借口，多不合理。（郭神父）就畫十字聖號，魔鬼即退，就可以睡，可以吃，一無魔磨難。後領聖水，就是上海第一個女人順從吾主耶穌。……徐公家有一用人，猝然病重，郭神父見之，與之講道理，且為之付洗，病即立愈。⁵

為了鞏固新教友的信德和熱忱，郭居靜仿效利瑪竇在北京的做法，在上海建立了“天主之母善會”，即聖母會，訂立了同樣的會規，

更進一步舉行依納爵奉行的八天避靜神功，以使基礎較好的教友日日精進。⁶郭居靜在上海居住期間，據當時記錄，兩年中有兩百餘人受洗，成為當時耶穌會南北四個住院傳教成績最好的住院。⁷郭居靜當時還想在上海建立耶穌會的第五個住院，專為此事親自到南京，徵詢新任會長龍華民的意見。據稱，由於當時耶穌會經濟拮据，而支持者徐光啟又要返回北京，不能常在上海，況且上海當時只是一個縣，並非省會城市，所以郭居靜在上海建立第五個住院的設想未能成功。與此同時，耶穌會決定將第五所住院建在杭州。⁸

杭州為浙江省的首府，南宋時曾以此地為京城，是全國名都大邑之一。明代杭州有居民百餘萬人，三十萬戶，為出產絲綢的中心，城內有織工六萬餘人，堪稱富饒之地，同時也是江南人文薈萃之地。因此耶穌會決定開教杭州，並在杭州建立住院。當時的會長龍華民又將杭州開教的任務交給了郭居靜神父。據《徐文定公事實》記載：

彼時有四位盼望進耶穌會相公，學習規矩，已經完全。有一位名賴方濟各者，到上海來相助神父分辦事件。其時，神父相公欲往浙江省城，以杭州是大地方，宣傳聖教，當比別處容易。在徐公安排上海教友，雖然少不得神父，但甘心預備神父動身，一心只望聖教會光榮。⁹

當時已經受洗入教的官員李之藻丁憂返回杭州，途經南京，亦邀請郭居靜赴杭州開教：

公友太僕卿李我存諱之藻，實先從事焉。歲辛亥，我存公官南都，與利先生同會郭仰鳳、金四表交善，比告歸，遂延郭、金二先生入越。¹⁰

1611年5月，郭居靜與新近來華的金尼閣神父及傳道員鍾鳴仁修士前往杭州。剛到杭州，就有一名年輕異教徒自願“歸正奉教”。¹¹三人抵達杭州後，李之藻將他們安排在自己城外的

傳教佈道

別墅居住。1611年5月8日聖彌額爾瞻禮日，郭居靜在杭州舉行了首次彌撒。在李之藻的幫助下，郭居靜、金尼閣為著名士人楊廷筠解釋教義，前後歷時九天，¹²最終說服了楊廷筠，“屏妾異處，躬行教戒，先生鑑其誠，俾領洗焉”。¹³楊廷筠洗名彌額爾（Michael），在堂中供救主像，把佛堂改為教堂，名為“救主堂”，當時即有三十餘人受洗。¹⁴期間，郭居靜等三人先後染病，逗留杭州數月之後，不得已退回南京，因人手短缺，打算放棄杭州。李之藻再次赴南京邀請郭居靜重來杭州，龍華民亦指示杭州傳教不能半途而廢，遂以林斐理代金尼閣，以石宏基代鍾鳴仁，1612年復活節後，郭居靜攜林、石二人重至杭州傳教。¹⁵

楊廷筠曾為朝廷大員，又是杭州名宦，在杭州地區具有很高的威望和影響力。楊廷筠奉教後，奠定了杭州教務發展的穩固基礎，無論在人數上，還是教徒層次上，以及教會組織上，杭州都可以與上海相媲美。¹⁶此後，杭州、上海兩地教務均由郭居靜負責。兩年中，他們收穫頗豐，杭州教徒達至500人。¹⁷1622年，在杭州又有191人受洗，其中有學者和名士多人。¹⁸1627年，李之藻和楊廷筠同回杭州，在私第之側建築住院及教堂各一所。¹⁹中國耶穌會第五所住院——杭州住院正式建立，郭居靜任住院院長主持教務。

除上海、杭州兩地的開教活動以外，1620年，郭居靜還到嘉定開闢了第三個傳教中心。嘉定是由郭居靜勸化奉教的進士孫元化（依納爵）的故鄉，在嘉定建有住宅，內設小聖堂和學校，環境幽靜，有園林綠地和魚塘，居室和書房佈置得非常得體優美，據說與歐洲的公學校相比也毫不遜色。這個地方成為周圍鄉鄰們休憩的好去處，又是講道學習的良好場所。葡萄牙耶穌會士費奇規即在其中為傅汎濟和鄧玉函兩位新來的神父講授漢語，講學之暇，兼事傳教，時受洗者已有60人。²⁰蕭若瑟稱：

江蘇嘉定縣有舉人孫元化，字初陽，在京做官，因與徐光啟善，被化領洗，聖

名依納爵。天啟元年，告假還家，乃赴杭州楊廷筠家，邀西士至嘉定開教。元化自捐巨貲，建聖堂一座，又在聖堂左近，建屋宇十餘椽，以為教士住宿之所。時謝務祿，變姓名為魯德照（曾德昭），新自澳門來，即偕郭居靜隨元化至嘉定，而駐足焉。計三四年中，向化領洗者，以數百計。魯司鐸曾寄書西洋，曰嘉定教友，男女老幼俱極熱心，日與彌撒，喜聽道理，勤領聖事，即西洋熱心教友區，亦不過爾爾也。厥後西士即以嘉定為總堂，比於杭州，常有教士駐足。²¹

郭居靜神父晚年住在杭州住院，雖然年邁體弱，步履維艱，常需請人扶持，但神志清醒，尚能執筆，並未中輟傳教工作。1634年和1635年，先後有148名和176名成年人經其受洗奉教。1640年1月19日，郭居靜病逝，終年80歲，遺體葬在杭州城外大方井墓地，杭州和上海兩地教友為其舉行盛大殯葬儀式。²²郭居靜從1598年到南京傳教，直到1640年在杭州去世，期間雖有短暫時間返回澳門養病，但絕大部分時間都奔走在江南地區的各城鎮之間，時間長達42年。在此期間先後在上海、杭州、嘉定三地開教，為天主教在江南地區的早期傳播與發展奉獻了全部心力。

二、衛匡國：清初杭州傳教士漢學家

意大利耶穌會士衛匡國是清初江南地區尤其是杭州傳教史上最為重要的人物之一。他1614年生於意大利特蘭托（Trento），1632年加入耶穌會，1634年完成見習修士期滿後，在羅馬神學院學習修辭學兩年，1636年又在羅馬神學院學習哲學課程兩年，他的導師就是著名的數學家、博物學家基歇爾（Athanasius Kircher）。²³1638年12月，衛匡國乘坐一艘英國船從熱那亞出發來華，經過三年零八個月的旅行（1638年12月至1642年8月）才到達澳門，在澳門停留不到一年後被派往杭州。²⁴衛匡國來華時，正值明清鼎革之際，地方不靖，混亂的政治局面迫使他從澳門前往杭州時，不

傳教佈道



圖1. 衛匡國江南省圖（繪於1655年）。原題名：“Nanking sive Kiangnan, Imperii Sinarum Provincia Nona”，作者：衛匡國。原件藏於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複製提供。本圖選自衛匡國《中國新圖集》（*Novus Atlas Sinensis*），該集是第一部在歐洲正式出版的中國地圖集，首版以拉丁文出版，後被譯成法文、西班牙文、德文等多種文字，在歐洲產生了深遠影響。圖的左下角繪有身着儒服和官服的歐洲傳教士形象。圖中以不同符號表示出府、縣、衛，用虛線和不同顏色的線條區分州界。省城江寧（今南京）被畫成歐洲城堡式樣，其右上角繪有帶十字架的“IHS”符號，表示這裡建有天主教堂。除江寧外，還有多地繪有教堂標記，包括上海、杭州、蘇州、常熟、淮安等。

得不選擇最安全和快捷的“使團路線”。²⁵1643年夏天，衛匡國從澳門出發，經珠江到廣州，轉北江至南雄，過梅嶺通道，到南安，由漳河到贛州，再經贛江到江西首府南昌，進鄱陽湖轉入長江而到九江，繼續沿長江向東北方向行進，過安徽省，到達江蘇境內，並進入南京城，在南京一位奉教官員的引領下，參觀了明帝陵，逗留數日之後，經長江轉大運河到蘇州，從蘇州南行進入浙江境內，隨後到達杭州。²⁶

衛氏在抵達杭州之前，先到上海拜會潘國光神父，並開始學習漢語。他為自己取了一個中文名字，姓“衛”，名“匡國”，為“匡救國家”之意，號“濟泰”，取“幫助、協助、救助”之意，表明自己匡扶、保衛大明的心意。他抵達杭州之初，住在杭州住院，奉命與年事已高的陽瑪諾作伴，但主要是研究漢語。²⁷隨後便以杭州為中心遊歷了江南省和浙江省的許

傳教佈道



圖2. 衛匡國在《廣輿記》“廣東省圖”上的筆記（作於1651-1654年間）。原件藏於梵蒂岡圖書館，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複製提供。衛匡國在《中國新圖集》（*Novus Atlas Sinensis*）中，繪製地圖及撰寫圖說時主要參考了萬曆年間凝香閣插輯本的《廣輿記》，並在書中所附的地圖上添加了許多註記和經緯度參照網，以便推算圖中各地的經緯度數據。

多地方，²⁸緊接着又遊歷其他若干省，北至京師，抵於長城。所經數省一一繪圖而測之，定其經緯。²⁹對一個毫無在華經驗、漢語尚且生疏的外國人來說，這個時候在中國四處遊歷，是一種十分冒險的行為。³⁰但這次遊歷為衛匡國交往中國地方官員和士大夫提供了條件，方豪所藏《辯學》抄本稱：“衛慷慨豪邁，往還燕、趙、晉、楚、吳、粵，啟誨甚多，名公鉅卿，咸尊仰之，希一握手為幸。”³¹

1644年7月，衛匡國奉艾儒略之命重返杭州，接替當時主持杭州教務的孟儒望神父。1645年8月，清軍攻佔杭州，他又被艾儒略派往福建延平傳教。當時，福州政權的重臣朱大典屢次邀衛匡國進宮做官，同時教授“有關歐洲的知識”。儘管衛匡國多次拒絕，但朝廷還是命令他穿上繡有龍圖案的高官官服。當時隆武帝的重臣都對衛匡國在彈道學、鑄造大炮及火藥製造等方面的知識極感興趣。作為這方



圖3. 衛匡國畫像（繪於1654年）。作者：米卡葉琳娜·瓦蒂（Michaelina Wautier, 1604-1689），是西班牙統治下的南尼德蘭地區（今比利時）一位重要的女性油畫家。該畫在2016年科勒（Koller）藝術品拍賣中以480,500瑞士法郎成交。油畫中衛匡國身着絲質的滿人服冠，堅定的目光和厚實的軀體烘托出他堅毅的性格。頭像的右上方寫有三個中文字“衛匡國”，並在右邊用羅馬字母註有這三個字的讀音“Guei”“Quam”“Que”。1650年，衛匡國受耶穌會之命赴羅馬報告“中國禮儀之爭”等傳教事務，1653年抵達阿姆斯特丹，途經安特衛普、萊頓等地，最終在1654年到達羅馬，本畫即在此期間繪製。

面的專家，衛匡國和隆武朝素有“火藥大臣”之稱的劉中藻將軍有着密切的聯繫，也正因為此事，衛匡國遭到了在福建的多明我會士的批評和指責。³²1647年年初，衛匡國從福建返回浙江，行至溫州附近的里安縣，正好與南下的清軍相遇，衛匡國遂在門口題寫“泰西傳佈聖法士人居此”字樣，並“將所攜之書籍、望遠鏡及其他諸異物陳列桌上，於中設壇，上掛耶穌像。……韃靼見之驚異，未加害，其主將召匡國至，禮接之，去其漢人衣，易以韃靼服，遣回杭州教堂，出示禁止侵犯。”³³

衛匡國在返回杭州之前，於1647年6月抵達金華府蘭溪縣，在蘭溪建立一座新教堂，這應是蘭溪的第一次開教，但這座教堂後來劃歸多明我會。據有關資料，1648年時衛匡國還曾到寧波傳教，後因戰事，被逐出寧波，轉而到常熟接替賈宜睦神父。³⁴後來再次返回杭州，被任命為杭州地區耶穌會會長，主持杭州住院。³⁵在杭州傳教期間，時有清兵騷擾，蕭若瑟稱，衛匡國傳教於浙省，駐杭州之時居多。清兵南下時，與統兵大員佟國器交善，³⁶再加上衛匡國已經剃髮易服，對清王朝表示了順從，在佟國器的保護下，杭州教堂未受清兵破壞。清初杭州的傳教事業發展很快，僅在1648年，衛匡國就為250人授洗，其中有許多士人，還有一位來自雲南的進士，教名為保祿。當時楊廷筠的女兒（教名阿格奈）是衛匡國的重要幫助者，她“亦率諸貞女佈教杭州。”³⁷杭州住院在明代時已成為全國範圍內重要的修道院，明清鼎革之際，由於衛匡國的管理，杭州住院和浙江教務實現了平穩過渡。

由於衛匡國具備專業的數學知識背景，當時中國副省會長陽瑪諾安排他去北京，希望他能與欽天監的湯若望合作，推動北京地區乃至清朝宮廷的傳教事宜。衛匡國抵達北京後，找到湯若望，希望在他的幫助之下在欽天監謀得職位。但湯、衛二人都是性格固執而且獨行獨斷的人，因此合作並不愉快。湯若望不滿衛匡國的魯莽，故意與他疏遠，還擔心他曾在南明王朝當過大官，會影響清朝統治者對耶穌會士的良好印象。因為得不到湯若望的支持，禮部拒絕了衛匡國留在北京的請求。衛匡國在北京停留的時間很短，大概只有一個月，不得已返回杭州。³⁸

1650年，衛匡國在杭州被選為耶穌會司庫，陽瑪諾會長派他赴羅馬報告中國傳教事務，尤其是“中國禮儀之爭”的問題。1651年1月，衛匡國取道福建，經菲律賓群島前往歐洲。沿途在德國、比利時、荷蘭等地演講，宣揚中國傳教事業，招募傳教士，並在阿姆斯特丹刊行其《中國新地圖集》等書。1654年到達羅馬，

傳教佈道

經過五個多月的討論，終於獲得教宗亞歷山大七世與樞機省的許可，降諭許用中國禮儀，諭令日期在1656年3月23日。³⁹ 衛匡國隨即帶領了一大批新招募的傳教士返回中國，於1657年從里斯本啟航。一路歷經坎坷，所帶領的17名傳教士當中有12名在海上遇難。⁴⁰ 1658年7月抵達澳門，當時澳門正發生騷亂，廣州當局禁止外國人進入內地，衛匡國因此滯留澳門。直到1659年2月，澳門騷亂趨於平穩，加上衛匡國的好友浙江巡撫佟國器等人的幫助，衛匡國得以成行赴杭，而且沿途一直被奉為上賓。另有九名耶穌會士與他同行，受他的委派前往中國各地傳教。⁴¹

重返杭州之後，衛匡國雄心勃勃，計劃在杭州大展抱負，得到佟國器等重要官員的支持。衛匡國在杭州選址建築新教堂，定址於天水橋附近北關門內。⁴² 由佟國器之妻亞加大（Agathe）與肅王妃猶第大（Judith）出資，新教堂於1659年動工，到1663年洪度貞到達杭州之時落成，“壯麗冠於全國”。⁴³ 衛匡國曾在1660年舉行“開堂禮”，“時受洗者二百零七人”。⁴⁴ 蕭若瑟稱：

佟國器以戰功授浙江巡撫，駐節杭州，嫌舊堂湫隘，捐俸金若干兩，勸衛匡國神父重建宏敞者。期年堂工告竣，悉依洋式。規模之華麗，為各省聖堂之冠。國器於公餘之暇，輒來堂中，與衛神父談道。⁴⁵

方豪私藏《辯學》抄本稱：

（衛匡國）至戊戌順治十五年再至中華。比來杭，陽（瑪諾）已故，衛因留杭代理陽事，焚修傳道。值杭城安插八旗於西南隅，天主堂逼迫營伍，居民昭事者艱於往來，衛復建於天水橋之南，造作制度，一如大西，規模巨集敞，美奐美輪，杭之人士更相企慕，接踵而來問道者，交遊極多。⁴⁶

衛匡國主持杭州教務期間，和當地達官貴人、縉紳名流廣泛交往周旋，並將傳教重心傾向於中下層青年知識精英。採取的方式之一，便是在譯著方面進行合作。如出生於官宦之家的寧波舉人朱宗元受洗後，對傳教極其熱誠，他想與衛匡國一起把耶穌會有名的神學家蘇何勒滋（Francisco Suárez）的著作譯成中文，因1650年衛匡國返回歐洲，這一項翻譯計劃被迫中止。⁴⁷ 又如1647年，衛匡國在蘭溪遇到青年學者祝石，他循循善誘，向祝石進行了五天的講解傳授，彼此切磋，兩人還交換了對友誼的看法。在祝石的請求下，衛氏完成了《迷友篇》，祝石為其作序。⁴⁸ 值得一提的是，1659年，西班牙方濟各會士利安當（Antonio de Santa María Caballero）突然到杭州造訪，衛、利二人作為禮儀之爭中對立雙方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展開了一場面對面的辯論，當時在辯論現場的還有殷鐸澤、魯日滿和蔡安多。從利安當撰寫的對衛匡國極力批判的作品內容，可以看出衛匡國為維護中國禮儀問題做出了巨大努力。可惜的是，他沒有留下此次辯論的言詞和文字，很可能與他過早辭世有關。⁴⁹

衛匡國在主持杭州新教堂建設期間，得了嚴重的肥胖症和便秘，遂求診於中醫，因治病心切，服食過量中藥，尤其是過量的大黃，導致病情加重，終於無藥可治，於1661年6月6日去世，終年47歲。⁵⁰ 據後人記載，衛匡國行事得體，學識淵博，無論教內教外，一致受人尊敬，在他彌留之時，仍有官員到院探視。衛匡國去世後，葬於城外大方井墓地。1679年，殷鐸澤神父為遷移墓地，不得不打開衛匡國的棺柩，據說面色儼如生人。⁵¹ 此事亦有吳歷等人佐證，記曰“目睹其鬚髮未脫，肌膚尚存，巾幘殮布光彩猶新”，實“中華數千百年以來所絕無者也”。⁵²

衛匡國除了是一位成績顯著的傳教士，還是一位頗有成就的漢學家。他在歐洲時，除經辦負責的教會事務外，還利用餘暇刊印書籍，對西方認識中國貢獻頗多。衛匡國擅於繪圖，喜談科學，在中國各省旅行時，測定各地方位，

記錄物產、風土、新聞等。根據這些資料，他在阿姆斯特丹印行了《中國新地圖集》，圖中對中國十五省的繪製與描寫，為過去所未有。他初期來華時在中國境內的遊歷，見證了中國政治的風雲變幻，後來完成了《韃靼戰紀》，為當時西方人了解中國局勢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也可補中國正史之不足。他還把撰寫的中國古代史的手稿在歐洲付梓，對於介紹中國歷史與當時教務情況極有價值。⁵³1654至1656年，衛匡國從中國返回歐洲，帶回了有關中國的豐富的一手材料，從而成為基歇爾聞名世界的《中國圖說》（*China Illustrata*）的材料來源。⁵⁴他又仿照利瑪竇《交友論》編成《逖友篇》，遍採西方古代名賢論交友之說，書中還有杭州張安茂、徐光啟、孫爾覺、蘭溪祝石序言。同時，他的中文天主教著述也很豐富，有《天主理證》《靈魂理證》《辟輪回說》等等。⁵⁵

三、潘國光：上海傳教基石奠定者

潘國光，字用觀，1607年生於意大利西里島，1624年加入耶穌會，1637年到澳門，隨即被派到杭州學習漢語。同年，耶穌會副省會長傅汎際派費奇規把潘國光帶到上海住院接受訓練，讓他和黎寧石神父及陸有機修士一同學習，相信他在“一兩年內”就能在教團有所作為。⁵⁶潘國光一生傳教於江南地區，而在上海傳教時間最長。如果說郭居靜是上海天主教的開教人，那麼潘國光則可以稱為上海天主教基礎的奠定者。

潘國光來華後，深入長江以南沿海一帶開展教務，成績斐然。1639年，他來華才兩年，就在上海及其附近地區，使原來信佛的異教徒受洗皈依者達1,124人。第二年又有1,240人入教，崇明島的名醫徐啟元就在這一時期經潘國光受洗入教，同年潘國光應徐啟元之邀到崇明島開教。⁵⁷潘國光在上海傳教時，十分注意教徒精神方面的提升。1643年時，他把上海周邊鄉村的教徒分成30個敬奉聖母的男性團體。⁵⁸隨着教會追隨者增多，聖會的數量也有所增加。四年之後的1647年，潘國光管理着

40個聖會，確保所有教徒“每年懺悔一到兩次”。每個聖會團體都有自己的會長，負責安排聖事，充當教徒和耶穌會士的中間人。每年教會節日時，潘國光邀請各個聖會輪流到上海教堂領受聖事。1647年耶穌會年信中寫道，按照這個規劃，“傳教工作更加順利，潘國光的良心也得到了撫慰，因為他報告說，所有的堂區教友都來懺悔。”⁵⁹由於聖會組織的成功，潘國光確信已經找到管理眾多教徒宗教生活的理想方法。1648年，他向年信的匯編者送去另一份有關上海男性教徒聖會的報告。潘國光還講述了他如何成立了另外五個聖母會，使聖母會的總數達至55個。其中12個聖母會有自己的禮拜堂或祝聖地，其他的則在教徒家中聚會。⁶⁰高龍擊稱：

（潘國光）由於不能事事兼顧，便挑選較為熱心的教徒，組織各自善會，每一善會各有自己的目標，如“聖母會”，專為婦女；“天神會”，專為訓育兒童；“苦難會”，規定教徒每逢星期五，相聚公拜“苦路”。此外，士人的組織，名為“聖依納爵善會”，教士為他們，並和他們一起共同譯著多種宗教書籍。他們根據共同的材料，從事著述，經教士修訂核准，以供教內教外人士閱讀。潘國光最心愛的是傳教輔助員的善會，取名“聖方濟各沙勿略善會”，會員共有60人，負責到各家庭中向兒童或有志信教者講解教義。⁶¹

在潘國光的精心管理之下，上海天主教教務獲得快速發展，到1641年，由潘國光負責的教區已有教徒三萬人之多。⁶²何大化亦稱：“上海這些年的教友繁庶，數目增長很快，這歸因為教牧此間的潘國光神父的勤勞熱忱。”⁶³

潘國光在上海的傳教活動，受到徐光啟家族的大力支持，“徐的一個兒子、五個孫子和四個孫女都是教徒。潘的傳教活動得到了他們很大的幫助。”⁶⁴第一個幫助潘國光上海傳教的徐氏家族成員，就是徐光啟的獨子徐驥。蕭若瑟稱：

傳教佈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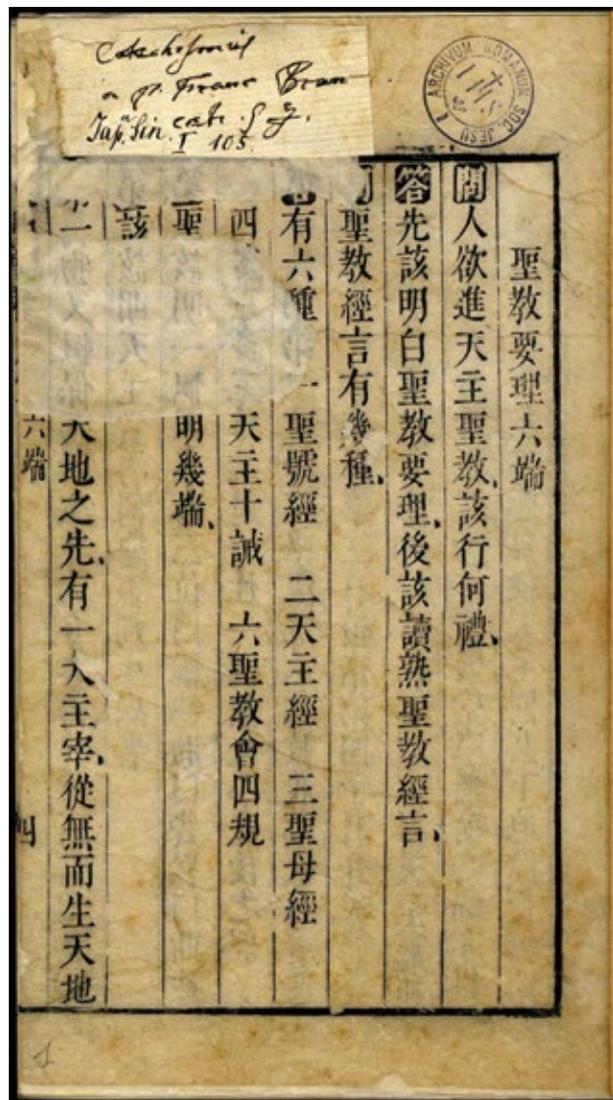


圖4.《天神會課》（1661年）。作者：潘國光。原件藏於羅馬耶穌會檔案館。該書採用一問一答形式闡明天主教理，淺顯易懂，用來作為針對青少年兒童或慕道者進行宗教教育的教材。本圖即為《天神會課》首篇“聖教要理六端”。

教務最盛者，首推江南。徐光啟提倡於先，其子徐驥聖名雅各伯提倡於後。……徐驥得恩蔭，為中書舍人，澹於仕進。居家善教子女，幫助潘國光建堂傳教。⁶⁵

因上海地區教徒人數大增，潘國光計劃建造一座大教堂。徐光啟的第四個孫女教名“瑪爾弟納”，適上海潘氏，其先世曾仕至尚書。

潘國光到上海時，瑪爾弟納之夫病故，從此守節，潘國光購置屋宇，改建教堂，瑪爾弟納助成其事。⁶⁶ 她幫助潘神父購得城內安仁里北世春堂。潘國光購得此堂後，“改其堂曰敬一，重加修葺，與舊日異矣。”⁶⁷ 敬一堂是上海第一座正式的天主教堂，上海天主教徒稱之為“老天主堂”。明松江府推官李瑞和記曰：

會先生以舊建堂卑隘，瞻禮者眾，不足以容，乃市安仁里潘氏之故宅為堂，而以向所建者供奉聖母。郡公為之給帖改建，而余為之序。時崇禎十四年辛巳春日也。⁶⁸

徐光啟長孫女洗名為“福禮濟大”，適上海艾氏，艾氏全家從此信教，在家中置小堂一所。福禮濟大的公婆信佛，與媳婦在信仰上相矛盾。後公婆患重病，主動要求入教，潘國光為其洗禮，四日後安然逝世。⁶⁹

1645年，主持南京教務的畢方濟奉命前往澳門，耶穌會上級調潘國光接替畢方濟主持南京住院，潘國光受命從上海前往南京，路過揚州時，正值清朝軍隊南下，明軍被迫退向長江口，上海教徒們擔憂清軍的蹂躪。當時外界謠傳稱潘國光支持明軍，戰敗後已經被處死，而南京已經禁止天主教，全國的天主教即將被消滅。潘國光遂決定放棄南京之行，返回上海保護教徒，使這些謠言不攻而破。⁷⁰

入清以後，潘國光在上海的傳教仍然得到徐光啟家族成員的支持，徐光啟長孫爾覺的夫人俞氏，洗名弗拉味亞，就是潘國光的重要助手：

潘國光神父在進行傳教任務時，在徐光啟家中得到一個可貴的助手。光啟長孫爾覺的夫人俞氏，洗名弗拉味亞，具有熱忱，竭力協助神父振作教徒的勇氣。徐府毗鄰有一具有勢力的富室，因有反抗新朝的嫌疑，為官府逮捕下獄。徐府僕人一見發生此事，都懷恐懼，急忙揭去門上

耶穌瑪利亞的名字，換上一般人的通用字句。俞氏發覺後，即命各處重貼耶穌瑪利亞之名，更顯示出教徒的身份。當時的教務報告書中載有俞氏創始的一件事，使我們知道現在流行於上海教徒的一種風氣，在當時已經開始。俞氏命銀匠鑄成金質銀質的耶穌利亞名字，塗上鮮豔彩釉，釘在帽上，使人一望而知自己的信仰，也為振作貧困教徒的勇氣。俞氏的熱心不僅限於這些外面的標誌，她悉心維持着“九間樓”旁光啟父子所修的教堂，邀集女教徒到堂中，為她們做好領受各種聖事的準備，以便潘國光神父為她們實行聖事。⁷¹

對潘國光的傳教工作幫助最大者，乃是徐光啟的第二個孫女許甘第大。費賴之稱：

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潘神父擔任上海住院院長兼上海地區的會長之職，並在上海城內興建了一座聖堂。那時，他又教名為甘第大的許太夫人的神師。……許太夫人通過她父親（徐驥）和兒子（許纘曾）的關係，把潘國光神父介紹給南京、蘇州、松江、上海等地的地方長官。由於他們的庇護和許太夫人的資助，潘神父才得以應付各種開支。1658年潘神父在許太夫人的家鄉松江造了聖堂和住所。在蘇州由許太夫人和一位武官的資助，也造了聖堂和住所。潘神父經常和其他幾個同伴分擔着工作，其中一人常駐上海管理教務……其他人則奔走於附近各地，給教友聽神工，給望教者付洗。⁷²

許太夫人雖然年輕時即已守寡，但主持家業有方，家境頗為富裕，她聽說當時在中國傳教的神父們極為貧困，便到家中小堂內，跪在苦像前許願，立誓要資助他們：

她決定對每一教士贈以二百金盾，救濟他們的急需；如以二十五個傳教士計算，總數將達二萬二千“利物爾”。她每天不忘這個志願，直至心願完成之日，便

把全部款項交給潘國光，設法分送各省教士每人二百金盾。⁷³

潘國光在上海傳教期間，與明清兩代地方官紳及從朝廷致仕的官員都保持着良好的關係，這從給“敬一堂”寫序送匾者的名單就可以看出。包括明崇禎時松江府推官李瑞和，清康熙時上海縣知縣涂贄、康文長，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傅冠，總漕巡撫戶部侍郎朱大典，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林欲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顧錫疇，松江府知府方岳貢，巡按江南蘇松等處地方統轄將領監察御史秦世楨等。⁷⁴秦世楨巡視地方後，還向清廷上疏，極力推薦潘國光，稱其“凜冽清奇，教謀濟世，實乃林下名流，可稱西天碩輔。”⁷⁵可以看出潘國光遵循明末以來利瑪竇的傳教路線，與明清各級官員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以獲得對上海天主教的庇護。

當時上海教務發展居全國之首，1664年楊光先教案爆發之前，江南地區僅在松江府一地城鎮鄉村已擁有教堂66所，教友五萬餘人；到潘國光去世時，留下教堂則是90所，祈禱所45處，而且每年總有2,000到3,000人領洗入教。⁷⁶當時全國的天主教徒不過114,200人，而潘國光所主持的教區就達到五萬餘人，幾乎佔到全國教徒人數的一半。

潘國光1671年4月25日病逝於廣州，但並未在當地下葬，而是由劉迪我等六位傳教士將他的靈柩運回上海，安置於上海南門外，距徐驥之墓不遠。因上海教徒大都由潘國光付洗，當時前來參加葬禮的教徒盛況空前，執紼會葬，備極哀榮。⁷⁷

四、魯日滿：蘇松平原上的“苦行僧”

魯日滿（François de Rougemont），字謙受，比利時耶穌會士。1624年生於比利時貴族之家，1641年進入馬利納（Malines）耶穌會初學院，在魯汶大學完成學業，在歐洲執教人文學和修辭學凡六年。⁷⁸自1659年到達中國

傳教佈道

之後，就一直在江南地區傳教，直到1676年在常熟去世。費賴之稱其“在澳門發願畢，始而派往浙江，已而派往江南，除中間謫居廣州外，終其身皆在江南傳教。”⁷⁹

1654年12月，波蘭耶穌會士卜彌格組織了一個前往東印度和中國的傳教團返回中國，魯日滿亦在其中。1658年7月，船隊抵達澳門。⁸⁰1659年3月5日，衛匡國從澳門出發前往廣州，目的是返回他過去的傳教點杭州，魯日滿和新來的意大利傳教士殷鐸澤隨行。在廣州，他們邂逅一位來自松江的官員，他是衛匡國的朋友，在他的照拂之下，以後的旅行變得十分舒適。他們沿着大運河到達杭州，抵達日期是1659年6月11日，⁸¹住在關橋附近的舊會院和教堂。⁸²魯日滿在衛匡國的親自監督之下，在杭州學習漢語。⁸³

魯日滿的基礎學習結束之後，被派到上海傳教區。當時上海是整個江南省甚至是整個中國最為繁榮的傳教區之一。魯日滿1662年到常熟之前，曾與潘國光神父短期搭檔。魯日滿在1661年7月27日信中，稱潘國光為“老師”，表達了自己對他的忠誠。他還以潘國光為榜樣，說明一位在中國工作的傳教士所要具備的理想素質。⁸⁴魯日滿的書信反映了他在這段時期內的傳教活動，他報告說，在兩個月內（1661年6至7月）訪問了分佈於上海地區各處的27座教堂，為六百多人施洗，並且相信每年可以平均增加2,000名教徒。⁸⁵1661年7月底，魯日滿被派到附近的蘇州府，蘇州雖然是該府的行政中心，但是實際上耶穌會的住院卻不在蘇州，而在常熟。⁸⁶常熟有一個穩定的耶穌會會院，反映出當時常熟天主教十分繁榮，蘇州的局面無法與之相比。長期以來，賈宜睦是常熟唯一的傳教士。魯日滿到達常熟後，最初是幫助賈宜睦，稍後便全盤繼承了他的工作。⁸⁷1662年9月4日，賈宜睦去世，魯日滿成了他的繼任者，負責整個蘇州府的教會事業。⁸⁸高龍鞏《江南傳教史》提供了魯日滿在蘇州最初的傳教細節：

魯日滿曾在蘇州為一隊來自北方的兵丁付洗，這些兵丁，連同妻子、兒女和奴隸，共有四百餘人，都成為教徒。他們駐紮在蘇州的三年內，信教極為熱心。正當日滿與其他教士提解北京時，他們恰巧也調往北方。出發時，他們對日滿表示非常感激，並表示如遇教難，決不變心。⁸⁹

根據耶穌會1662年的年信，魯日滿在江南傳教活動的地區以蘇州、常熟、昆山和太倉為重點，還有一些“從屬於常熟教堂的其他教堂”。⁹⁰1669年魯日滿被扣押在廣州時，在寫往歐洲的信中也作了同樣的說明：

在蘇州這個美麗的大城市，以及其他三個較小的城市太倉、昆山、常熟等地的天主教社會中，我是惟一的神父；常熟的教徒很多，其他三個城市中教徒數量很少。⁹¹

這說明魯日滿負責的蘇州府教務，除蘇州以外，常熟、昆山、太倉也引人注目，尤以常熟最為顯著：

在昆山，新教友們一片熱誠，積極籌措資金，準備興建教堂。在太倉，情況相似，許太夫人特地購置了一所寬敞的宅第，作為建堂之用。常熟教友的特點是：學習教理孜孜不倦，救靈事業蒸蒸日上；在那裡已組織了14個熱心善會，由十名學識淵博、熱心出眾的文人領導，他們在教外人中的活動取得了輝煌成果。⁹²

清代崇明島屬太倉州管轄，所以魯日滿亦負責崇明的教務：“1662年有一位秀才先生主動請去崇明島開教，他的德表和訓誨，在三個月間就培訓了兩百多名望教者。”⁹³

楊光先教案爆發後，1665年1月4日，魯日滿前往蘇州聽候知府處理，常熟知縣李璞⁹⁴四處找不到神父，認為他已潛逃，不相信他已主動去蘇州投案。魯日滿得知此情，隨即

返回常熟投案。李璞一見，深感欽佩，結為知交，並許下諾言，在神父離開期間保護教徒。⁹⁵於是，魯日滿同其他傳教士一起被押往北京受審，後被拘押廣州五年有餘。1671年9月8日，傳教士們離開廣州，魯日滿在11月底到達常熟。魯日滿在離開常熟前往北京受審之際，對傳道員等教會負責人進行了周密安排，因此常熟的教會生活在教案期間得以延續。有材料表明，到1668年底，即廣州扣押不到四年的時間，常熟有超過三百人成為新教徒；同一時期，上海有超過一千人受洗入教。⁹⁶根據萬多瑪斯（Thomas Valgameira）提供的信息，魯日滿和柏應理從廣州返回後，各自在他們的傳教區作了八天的旅行，藉以鼓舞當地教徒的熱情，其間又有400人受洗。⁹⁷杜寧·茨博特稱魯日滿：“謫限既滿，1671年重返江南，在太倉、常熟等處建築新堂，本人則長駐常熟。”⁹⁸費賴之則稱：

尤其在河港交叉的昆山地區，教外人領洗入教者更多，達數千人。神父每巡視一地總有近百人受洗……魯神父平日對聖方濟各沙勿略特別虔敬，並大事宣揚，力勸人們效法聖人的德行；他又散發給教友大量的聖人的聖像。⁹⁹

《魯日滿行誼》詳細記錄了昆山地區教徒受洗的事例：“三天之內，我為119人施洗；……昆山地區有約一百人等着受洗；……我在昆山度過，那裡有240人等待受洗；……83人已經受洗，還有八百多人等待受洗。”¹⁰⁰魯日滿還創建了聖母會、苦修會等各種聖會組織，常年奔波於蘇州府城市和鄉村。除蘇州府外，他的傳教活動還延伸至其他地方，尤其是松江府和浙江北部。¹⁰¹他與杭州傳教站關係密切，在1675年的私人賬本中多次提到杭州之行，到杭州主要是接管洪度貞的工作。¹⁰²根據賬本中的記錄，他終日“被許多告解和洗禮所累”¹⁰³。簡單看一下他的工作量即知：

日滿所管理之教堂共有十四所，禮拜堂二十一所，並將潘國光神甫在上海

所建設之天神會、聖母會、聖依納爵會、聖方濟各會大為發展。以所得佈施建設學校，延在教士人為教員，每人年修銀三十兩。¹⁰⁴

魯日滿非常重視培育青少年，省吃儉用，用各種渠道積攢的錢開辦學堂。他認為：“那是我們將來全部希望之所托，我們不能把青少年的信仰和純潔品德置於教外老師或信佛的塾師之手。”他親自向青少年傳授科學知識和修德齊身的倫理教育，以及如何過好宗教生活。¹⁰⁵

常熟傳教站與北京的耶穌會士們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聯繫。1675年1月，魯日滿根據在北京效力的利類思的要求，在常熟印刷駁斥楊光先的書籍。而魯日滿從廣州返回常熟之前不久，常熟傳道員何世貞即負責印刷教會書籍並寄往北京。利類思和安文思則從北京寄禮物給何世貞。魯日滿還給恩理格和南懷仁寄送禮品。此外，恩理格在1665-1670年同魯日滿和殷鐸澤一起，參與翻譯和修訂儒學經典。¹⁰⁶

大量超負荷的工作，長年奔走於城鄉之間，再加上生活貧困，健康不佳，魯日滿終於積勞成疾，不治而亡。1676年，魯日滿擬赴崇明，不久得疾，11月4日歿於太倉。他的遺體在11月14日被運到常熟，埋葬於虞山北麓的天主教墓地。¹⁰⁷

五、殷鐸澤：杭州天主教“護法神”

殷鐸澤，字覺斯，意大利耶穌會士。1625年生於意大利西西里島，是十七世紀後期在杭州傳教的關鍵人物。據說，殷鐸澤少時病重，某次恍惚間夢見方濟各·沙勿略前往中國傳教的召喚，病癒後毅然下定前赴中國的決心。¹⁰⁸1642年，他17歲，入耶穌會初修院，讀完神學後，即於1657年隨衛匡國啟程來華。1659年，殷鐸澤到達中國，隨同衛匡國前往杭州。“順治十六年，先生至杭州主堂，習中國語言文字”。¹⁰⁹1660年，被派往江西建昌，在建昌建築住宅一所，並將教堂修復，兩年間

傳教佈道

為 2,000 人授洗，“建昌以外諸城鎮之傳教所經其主持者沿有七處”。¹¹⁰ 殷鐸澤在建昌所做的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在 1662 年將郭納爵翻譯的《大學》刻印出版。他還首次將漢語原文和西文譯文對照刻於同一塊版片之上，這在當時是一項創舉。¹¹¹ 殷鐸澤在建昌的成功傳教，得益於與建昌知府的良好關係。但後來知府受人挑撥，轉而仇視天主教，逼走殷鐸澤，拆毀教堂：

建昌長官某初與鐸澤善，繼受屬吏讒，與教士為仇，誣報於省，謂鐸澤為匪首，並以教堂太高，有礙風水，欲拆毀之。雖經人關說與湯若望神甫致書，教堂仍不免於拆毀，修復者三次，拆毀亦三次。然鐸澤藏伏不出，該長官尚未敢逮捕鐸澤。¹¹²

1665 年，因楊光先教案，全國傳教士被解送北京受審，隨後被押往廣州扣押。在廣州扣押所，殷鐸澤負責傳教士們的衣食和醫療。¹¹³ 1670 年，他被選為中國副省教區代表，赴羅馬報告中國傳教事務。1671 年到達羅馬，他“一面請求教廷宣教部諸樞機員救濟在華教士，一面請求耶穌會長派遣新會士赴華。”¹¹⁴ 1674 年 8 月，殷鐸澤返回中國，到達廣東之時，始知被扣押在廣州的傳教士們已被釋放回各自的傳教點。他隨即被派到杭州，接手洪度貞在 1673 年 7 月去世時留下的傳教區。¹¹⁵ 當時，浙江巡撫張鵬翮向全省發佈禁教告示，稱當時殷鐸澤在杭州傳教，違抗皇旨，吸引一千多人加入天主教。¹¹⁶ 可以從側面看出殷鐸澤在杭州的傳教成績。1676 年，他被推選為中國日本傳教會巡視員，1687 年，又被推舉為耶穌會中國副省會長。從此一直在杭州傳教，直到 1696 年去世。

殷鐸澤在杭州傳教二十餘年，成為康熙中期杭州天主教會最為重要的核心人物。他在多年的傳教生涯中，推動或經歷了以下幾件在傳教史上影響深遠的事件：

其一，極大拓展了浙江省各地的天主教教務。據《泰西殷覺斯先生行略》稱，殷鐸澤“居杭州天主教堂，欲立修學，取士中士，乃鐸澤耶穌會例，默想諸書，以廣聖教。伏念浙省地廣人稠，會城一堂，不足以便遠以及來慕者，於是嘉興府海寧、平湖二縣峽石、王店、新坊、濮院諸鎮，皆辟堂設像，令歸教者得按期瞻禮，未入教者可觀感向道，以沐聖寵。為每歲巡歷各堂，認主入教者甚多，皆先生之拯救也。”¹¹⁷ 浙江地區在入清以後，經戰爭動亂和楊光先教案，杭州以外的諸傳教點多已喪失。殷鐸澤到杭州後，又拓展嘉興府的海寧、平湖二縣教務，建立教堂，授洗教徒，使浙江教務再次進入嘉興地區。

其二，擴展杭州大方井天主教公墓。該墓地始辟於明天啟二年（1622 年）。方豪稱：“1622 年，公（楊廷筠）獻杭州老東嶽附近桃源嶺麓大方井祖塋為教士墓地，鍾鳴仁、羅如望、金尼閣、龐類思、伏若望、徐日昇、黎寧石、郭居靜、陽瑪諾、衛匡國、洪度貞、殷鐸澤、法安多、艾奧庭等耶穌會士，均先後葬其地。但捐地時，已卒者僅鍾鳴仁一人。”¹¹⁸ 丁志麟《楊淇園先生超性事蹟》亦稱：“至是，為之購隴畝，築墳墓，並今教中貧乏者咸葬焉。又於隴中立一聖堂，以行大祭。祝祈主眷，佑其靈魂。”¹¹⁹ 1678 年，殷鐸澤又在大方井附近購入一大片土地，將原來的墓地擴充，正式開闢為傳教士公墓，“並將所有已逝世之傳教士遺骸，集中移葬該處。”¹²⁰ 這是中國境內繼北京利瑪竇柵欄墓園後第二處專門的天主教墓地。

其三，協助五位法國“國王數學家”進京。1687 年，五位法國耶穌會士在浙江寧波港登陸，他們是洪若翰、白晉、張誠、劉應、李明，是由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直接派遣到中國的“國王數學家”。隨着法國國力的強盛，路易十四與葡萄牙獨霸遠東傳教事務的局面針鋒相對，令這一批法國傳教士經暹羅到寧波登陸，而不是經傳統的里斯本—果阿—澳門路線。一行人於 1687 年 7 月 23 日抵達寧波，但受到浙江巡撫金鉉的阻攔，奏報朝廷，欲將他們遣到印

度。¹²¹ “是時，浙撫軍金知其事，上疏力請驅逐，士人稍齟齬之，諸先生進退維谷。”¹²² 洪若翰等人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聯絡他們在歐洲就相識的殷鐸澤。殷鐸澤全力幫助，派一名秀才傳道員為他們做翻譯，以便與寧波地方官員溝通。¹²³ 殷鐸澤深知這一批法國耶穌會士來華，將為天主教事業的發展意義重大，所以對他們說：“天主把你們從覆舟之災中援救脫險，正是為了讓你們挽救我們這個眼看後繼乏人、日趨衰落的傳教區，我不勝焦急地等待你們，現在你們終於來到，我該多麼高興啊！”¹²⁴ 可以看出，他對新來的法國傳教士寄予厚望。殷鐸澤同時寫信向北京的南懷仁求援，南懷仁向康熙皇帝進言，讚揚這批法國傳教士的科學才能，從而得到康熙的准許：“此輩非應驅逐出境之人，着起送來京候用，通曆法者可留用，餘人聽其隨便居住。”¹²⁵ 這五位法國傳教士，在以後的中國軍事、外交、傳教等事務上，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其四，在杭州受到康熙皇帝的接見。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二月初九日，皇帝赴江南巡視，駕臨杭州。當時主持杭州住院的殷鐸澤神父“特僱小船，恭持手本，迎至黃金橋，敬遇龍艦。蒙傳問：是何人？謹對：是天主堂殷鐸澤在此迎接聖駕。”¹²⁶ 康熙帝向殷鐸澤等傳教士詢問各種狀況，溫語撫慰。皇帝回鑾日，鐸澤欲遠送，康熙曰：“汝年高不能任遠行之勞，應留堂靜養。”¹²⁷ 還御賜珍果嘉餅四簋，復賜白鏹二十金，¹²⁸ 對殷鐸澤甚為禮待。

其五，推動1692年“容教詔令”的頒佈。時任浙江巡撫張鵬翮等官員為楊光先舊友，對天主教一向仇視。1691年，張鵬翮在一樁訟事中將殷鐸澤牽涉其中，借機欲拆除天主堂。“辛未，撫軍張嚴禁天主教，欲移天主堂，毀經像，以辱及教中人矣。”¹²⁹ 杭州天主教堂建造壯觀，拆毀一事受到眾多屬吏勸止，巡撫便將其改為佛寺，焚毀教堂內所有的書版，遂成“杭州教案”。康熙三十年七月十六日，張鵬翮向全省發佈了一道禁教告示，批評殷鐸澤未經許可在浙省居住，刻印天主教書籍，張掛天主教畫像，

吸引民人入教守齋，下令驅逐殷鐸澤等傳教士，懲罰習教者。告示原文今已不存，萊布尼茨《中國近事》一書錄有譯文：

浙江巡撫張鵬翮下令嚴格禁止任何西洋人向中國人介紹和講解關於他們天主教節日的日曆，以免引起他們皈依天主教之心，因為，這些行為違背皇上的詔令：我謹遵皇帝旨意，努力試圖使人民忠守儒家之道。我以此為原則，而獲得了治國之道。因為儒家之道，我們的臣民團結和睦，百姓安和樂利，對長輩更是講求孝悌。儒家之道有助於治國大業，使臣民對皇上服從效忠，也使皇上對人民愛護有加。此傳統是從我們的古時賢人周公與孔子一直傳授下來。恪守此仁義與孝悌之道，我們得以修身養性，一如天上日月，輝耀千秋，又如地上江河，向前流淌。道教和佛教若與儒家相比，就好似兩個小火炬，或似兩條小水溝。也許我們可以這樣認為，最近外來的這個教會是否還不如以上兩者？皇上以其智慧，強調獨尊儒術，閱讀四書五經成為晉升官職之必經之路。如此，與皇上同樣學習儒家之人成為中華帝國昭明顯著之士。這些官員憑恃經典，使工商各行各業都遵守皇上頒佈的六十條規定。人們對這些規定銘記不忘，使大部分都能爛熟於心。這些規定更引導無知的人順應天理，而這個的根就是服從天命。然可惜的是，我浙江臣民已跟着一個外來的宗教很久，他們聚會，引導更多人加入天主教。自明朝時，西洋傳教士便來到中國，至滿洲人入京之後，有詔令：“其天主教，除南懷仁等照常自行外，復立堂入教，仍着嚴行曉諭禁止。康熙八年。”後來，禮部也頒佈了另一詔令：“那些通曉曆法者應入京，與南懷仁同住。至於不諳曆法者，應各歸本省本堂。我們容許他們繼續實行其宗教之修道與禮拜。但我們嚴禁任何本省人皈依其教法。”禁教之法令被公佈，而載於禮部。關於殷鐸澤，我不知道他何時來到了江西，未經許可便定居

傳教佈道



圖 5. 中華帝國十五省圖 (1687 年)。製圖者：盧弗蒙 (François de Louvemont)；圖註：柏應理 (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地圖收錄於殷鐸澤、恩理格、魯日滿、柏應理等合譯並於 1687 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書中，此書漢文標題為《西文四書直解》，印本原件藏於蓋蒂研究所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地圖中繪出了明代中國的南北直隸與十三個布政使司，簡稱“十五省”；並標記出 155 個府以及其他重要地名。圖註說明了各省的府、縣數，以及治下人口戶數、教堂數和傳教士人數。

下來。他曾刻印關於聖神七恩與其他關於基督宗教的書。他還安排繪畫天主教的聖像，使老百姓在一些固定的節日對它們施禮敬奉，還有守齋等。他傳授別人天主教節日的日曆，吸引老百姓的心歸順天主教。後來，在杭州市，違抗皇旨，給一千多人受洗。因此，我們應該再次頒佈皇上的詔令，開除所有在我的控制之下的傳教士，嚴格懲罰那些不聽我們的勸告而皈依天主教的人。鑑於這些老百姓素質比較低，而盲目地被非法的宗教所吸引，所以我給他們另外一個機會奉行皇上的禁教詔令。既然還有人繼續盲目地皈依天主教，所以我下令，檢查所有的地方，馬上提醒他們。我控告殷鐸澤違背皇室的詔令；他吸引人民皈依一個邪教。他應該受到嚴厲的懲罰。任何幫助違背這個法令的人，或視而不報，要受到與殷鐸澤同樣的懲罰。

康熙三十年七月十六日

殷鐸澤不得已在民間躲避，同時致書北京，向北京的傳教士們求援，請他們奏請皇帝保護。康熙三十年（1691）在欽天監治理曆法的徐日昇和安多的奏疏稱：

杭州府住堂臣殷鐸澤使人來稱：彼處巡撫令地方官毀教堂、破書板，目為邪教，逐出境外，臣等孤獨，倚倚無儔，亦不敢與人爭辯是非，惟祈皇上睿照。¹³⁰

在北京傳教士們的數度奏報並在索額圖等大臣的斡旋之下，幾經波折之後，杭州教案得以平息。以此事為契機，康熙皇帝在1692年3月22日最終批准頒佈了著名的“容教詔令”：

查得西洋人仰慕聖化，由萬里航海而來。現今治理曆法，用兵之際，力造軍器火炮；差往阿羅素，誠心效力，克成其事，勞績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並無為惡亂行之處。又並非左道惑眾，異端生事。喇嘛僧道等寺廟尚容人燒香行走，西

洋人並無違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屬不宜。相應將各處天主堂俱照舊存留，凡進香供奉之人，仍許照常行走，不必禁止。¹³¹

康熙三十一年年的“容教詔令”在中國天主教傳教史上意義重大，儘管在隨後的幾年，因“中國禮儀之爭”問題愈演愈烈，最終仍然導致禁教，但這個詔令的頒佈，是天主教在法律上得到認可的第一份官方文獻。當年四月三十日，殷鐸澤赴北京向皇帝致謝，被康熙以“老人家”相稱，對他尊重備至。¹³²“容教詔令”頒佈後，中國天主教進入順遂時期。殷鐸澤也一直在杭州傳教，直到1696年10月3日去世，葬於大方井墓地。



傳教佈道

註釋：

1. 《明末清初進入江南地區的耶穌會士（上）——從江南開教到領票傳教》，《文化雜誌》2020年總第108期。
2. [法]高龍鞏著，周士良譯：《江南傳教史》，第1冊，卷2《徐光啟》，第3章，《上海開始傳教與杭州建立住院》，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28-129頁。
3. [比]鍾鳴旦等編：《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續編》，第14冊，佚名《徐文定公事實》，台北：台北利氏學社，2013年，第182-183頁。
4. [法]費賴之著，梅乘騏、梅乘駿譯：《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1552-1773）》，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啟社，1997年，第64頁；[法]高龍鞏著，周士良譯：《江南傳教史》，第1冊，卷2《徐光啟》，第3章，《上海開始傳教與杭州建立住院》，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29頁。
5. [比]鍾鳴旦等編：《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續編》，第14冊，佚名《徐文定公事實》，台北：台北利氏學社，2013年，第186-189頁。
6. [法]費賴之著，梅乘騏、梅乘駿譯：《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1552-1773）》，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啟社，1997年，第65頁。
7. [法]高龍鞏著，周士良譯：《江南傳教史》，第1冊，卷2《徐光啟》，第3章，《上海開始傳教與杭州建立住院》，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29頁。
8. [法]高龍鞏著，周士良譯：《江南傳教史》，第1冊，卷2《徐光啟》，第3章，《上海開始傳教與杭州建立住院》，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30頁。
9. [比]鍾鳴旦等編：《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續編》，第14冊，佚名《徐文定公事實》，台北：台北利氏學社，2013年，第193頁。
10. [比]鍾鳴旦等編：《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第1冊，丁志麟《楊淇園先生超性事蹟》，台北：方濟出版社，1996年，第218頁。
11. [法]費賴之著，梅乘騏、梅乘駿譯：《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1552-1773）》，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啟社，1997年，第65頁。
12. [法]高龍鞏著，周士良譯：《江南傳教史》，第1冊，卷2《徐光啟》，第3章，《上海開始傳教與杭州建立住院》，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36頁。
13. [比]鍾鳴旦等編：《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第1冊，丁志麟《楊淇園先生超性事蹟》，台北：方濟出版社，1996年，第221-222頁。
14. [法]高龍鞏著，周士良譯：《江南傳教史》，第1冊，卷2《徐光啟》，第3章，《上海開始傳教與杭州建立住院》，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37頁。
15. [法]高龍鞏著，周士良譯：《江南傳教史》，第1冊，卷2《徐光啟》，第3章，《上海開始傳教與杭州建立住院》，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31頁。
16. [法]費賴之著，梅乘騏、梅乘駿譯：《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1552-1773）》，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啟社，1997年，第65頁。
17. [法]高龍鞏著，周士良譯：《江南傳教史》，第1冊，卷2《徐光啟》，第3章，《上海開始傳教與杭州建立住院》，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31頁。
18. [法]費賴之著，梅乘騏、梅乘駿譯：《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1552-1773）》，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啟社，1997年，第66頁。
19. [法]高龍鞏著，周士良譯：《江南傳教史》，第1冊，卷2《徐光啟》，第3章，《上海開始傳教與杭州建立住院》，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34頁。
20. [法]費賴之著，梅乘騏、梅乘駿譯：《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1552-1773）》，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啟社，1997年，第66頁。
21. 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卷4，《自沈淮教難至崇禎末》，台灣：輔仁大學出版社中國天主教史籍匯編本，2003年，第104頁。
22. [法]費賴之著，梅乘騏、梅乘駿譯：《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1552-1773）》，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啟社，1997年，第66-67頁。
23. [意]白佐良（Giuliano Bertuccioli）：《衛匡國生平及其著作》，載《把中國介紹給世界：衛匡國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1-12頁。
24. [意]白佐良：《衛匡國生平及其著作》，載《把中國介紹給世界：衛匡國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2-15頁。
25. David E. Mungello, *The Forgotten Christians of HongZhou*,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p. 20.
26. David E. Mungello, *The Forgotten Christians of HongZhou*,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p. 24.
27. [法]高龍鞏著，周士良譯：《江南傳教史》，第1冊，卷4《明朝的滅亡》，第8章，《明亡時中國教務狀況》，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58頁。
28. [意]白佐良：《衛匡國生平及其著作》，載《把中國介紹給世界：衛匡國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6頁。
29. [法]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261頁。
30. G. Melis, Martino Martini's Travels in China, in G. Melis (eds.), *Martino Martini, Geografo, Cartografo, Storico, Teologo*, Trent, 1983, pp. 434-439.

31. [清] 靜樂居士編：《辯學》不分卷，《大西修士行略纂》，台北：台灣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藏方豪舊藏清鈔本，第 42 頁。
32. [意] 白佐良：《衛匡國生平及其著作》，載《把中國介紹給世界：衛匡國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年，第 17-18 頁。
33. [法] 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第 261 頁。
34. [法] 高龍鞏著，周士良譯：《江南傳教史》，第 2 冊，卷 1《明清易代之際的中國教務》，第 6 章，《江南》，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 32 頁。
35. [法] 高龍鞏著，周士良譯：《江南傳教史》，第 2 冊，卷 2《順治朝》，第 2 章，《傳教人員》，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 42 頁。
36. 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卷 5，《自崇禎末至永曆末》，台灣：輔仁大學出版社中國天主教史籍匯編本，2003 年，第 150 頁。
37. [法] 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第 261-262 頁。
38. Sebes, Martino Martini' s Role in the Controversy of the Chinese Rites", in *Martino Martini, Geografo, Cartografo, Storico, Teologo*, pp. 477-478; [意] 白佐良：《衛匡國生平及其著作》，載《把中國介紹給世界：衛匡國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第 23 頁。
39. [法] 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第 262 頁。
40. [法] 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第 262 頁。
41. [意] 白佐良：《衛匡國生平及其著作》，載《把中國介紹給世界：衛匡國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第 36-37 頁。
42. Joseph Dehergne S.J, *Les Chrétientés de Chine de la Période Ming (1581-1650)*, 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ume 16, 1957, Issue 1-2, pp. 117, 118.
43.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冊，《衛匡國傳》，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第 115-116 頁。
44. [法] 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第 263 頁。
45. 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卷 5，《自崇禎末至永曆末》，台灣：輔仁大學出版社中國天主教史籍匯編本，2003 年，第 150 頁。
46. [清] 靜樂居士編：《辯學》不分卷，《大西修士行略纂》，台北：台灣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藏方豪舊藏清鈔本，第 42 頁。
47. 沈定平：《適應性策略的傳承與衛匡國的歷史貢獻》，載《把中國介紹給世界：衛匡國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第 55 頁。
48. [意] 白佐良：《衛匡國生平及其著作》，載《把中國介紹給世界：衛匡國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第 19 頁。
49. 參考張鎧：《衛匡國與“禮儀之爭”：論衛匡國與利安當之“杭州辯論”及衛匡國和閔明我的矛盾》，載《把中國介紹給世界：衛匡國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第 99-106 頁。
50. David E. Mungello, *The Forgotten Christians of HongZhou*,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p. 30.
51. [法] 高龍鞏著，周士良譯：《江南傳教史》，第 2 冊，卷 2《順治朝》，第 7 章，《1644-1664 年亡故的傳教士》，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 96 頁。
52. ARSI.Jap-Sin.166. 承宋黎明先生於 2019 年 9 月 23 日惠示此條資料。
53. [法] 高龍鞏著，周士良譯：《江南傳教史》，第 2 冊，卷 2《順治朝》，第 7 章，《1644-1664 年亡故的傳教士》，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 95 頁。
54. David E. Mu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Stuttgart, 1985, p. 138.
55.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冊，《衛匡國傳》，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第 115-116 頁。
56. Furtado to Dias the elder, Nanchang, 1 January 1638, BAJA 49-V-12:200V.
57. [法] 費賴之著，梅乘騏、梅乘駿譯：《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 (1552—1773) 》，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啓社，1997 年，第 254 頁。
58. António de Gouvea, *AL Southern Residences, Vice-Province 1643, Fuzhou*, 15 August 1645, in Gouvea, 129.
59. António de Gouvea, *AL Southern Residences, Vice-Province 1647, Fuzhou*, 20 January 1649, in Gouvea, 371.
60. Francesco Brancati, *AL Shanghai Residence 1648, Shanghai, 1648*, BAJA 49-V-13:479r/v.
61. [法] 高龍鞏著，周士良譯：《江南傳教史》，第 1 冊，卷 3《各省教務的進展》，第 3 章，《上海》，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 252 頁。
62. [法] 高龍鞏著，周士良譯：《江南傳教史》，第 1 冊，卷 3《各省教務的進展》，第 3 章，《上海》，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 252 頁。
63. António de Gouvea, *Annua da V.Província do Sul na China de 1644*, BAJA, 49-V-13, ff.523-523v.
64. 阮仁澤、高振農主編：《上海宗教史》，第 15 章《明末清初天主教傳入及其初步發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616 頁。

傳教佈道

65. 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卷4，《自沈澹教難至崇禎末》，台灣：輔仁大學出版社中國天主教史籍匯編本，2003年，第124-125頁。
66. [法]高龍肇著，周士良譯：《江南傳教史》，第1冊，卷3《各省教務的進展》，第3章，《上海》，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49頁。
67. [清]葉夢珠：《閱世編》卷10《居要》第二，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2007年，第242頁。
68. [比]鍾鳴旦等編：《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續編》，第14冊，《敬一堂誌》，台北：台北利氏學社，2013年，第7頁。
69. [法]高龍肇著，周士良譯：《江南傳教史》，第1冊，卷3《各省教務的進展》，第3章，《上海》，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50頁。
70. [法]高龍肇著，周士良譯：《江南傳教史》，第2冊，卷1《明清易代之際的中國教務》，第6章，《江南》，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0-31頁。
71. [法]高龍肇著，周士良譯：《江南傳教史》，第2冊，卷1《明清易代之際的中國教務》，第6章，《江南》，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31頁。
72. [法]費賴之著，梅乘騏、梅乘駿譯：《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1552-1773）》，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啓社，1997年，第255-256頁。
73. [法]高龍肇著，周士良譯：《江南傳教史》，第2冊，卷2《順治朝》，第5章，《順治朝江南教務》，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78頁。
74. [比]鍾鳴旦等編：《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續編》，第14冊，《敬一堂誌》，台北：台北利氏學社，2013年，第5-13、81-84頁。
75. [比]鍾鳴旦等編：《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續編》，第14冊，《王言謙論》，台北：台北利氏學社，2013年，第220頁。
76. [法]費賴之著，梅乘騏、梅乘駿譯：《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1552-1773）》，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啓社，1997年，第255頁。
77. [法]高龍肇著，周士良譯：《江南傳教史》，第2冊，卷4《康熙帝的青年時代》，第2章，《流戍的教士重返各省》，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82頁。
78. [法]費賴之著，梅乘騏、梅乘駿譯：《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1552-1773）》，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啓社，1997年，第379頁。
79. [法]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337頁。
80. [法]榮振華著，耿昇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577頁。
81. 衛匡國寫給耶穌會總會長尼克（G. Nickel）的信記錄了從澳門到杭州旅行的細節，ARSI, JS 162, f° 51r.-52r. 轉自[比]高華士著，趙殿紅譯：《清初耶穌會士魯日滿常熟賬本及靈修筆記研究》，鄭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第23頁。
82. Nicolas Standaert, Yang Tingyun, *Confucian and Christian in Late Ming China*, Sinica Leidensia, vol. 19, Leiden 1988, p. 687, n. 94; David E. Mungello, *The Forgotten Christians of HongZhou*,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pp. 28-30.
83. [比]高華士著，趙殿紅譯：《清初耶穌會士魯日滿常熟賬本及靈修筆記研究》，鄭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第23頁。
84. H. Bosmans, *Lettres inédites de François de Rougemont, missionnaire belge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en Chine, au XVIIe siècle*, in *Analect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Ecclésiastique de la Belgique*, 3ième série, IX, 1913, pp. 33-35.
85. [比]高華士著，趙殿紅譯：《清初耶穌會士魯日滿常熟賬本及靈修筆記研究》，鄭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第24頁。
86. ARSI, JS 117, f° 211v., and A. Chan, in: J. Heyndrickx (ed.), Philippe Couplet, S.J. (1623-1693), *The Man Who Brought China to Europe*,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1990, p. 69.
87. [法]高龍肇著，周士良譯：《江南傳教史》，第2冊，卷2《順治朝》，第5章《順治朝江南教務》，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77頁。
88. ARSI, JS 112, f° 153r.-154r. 轉自[比]高華士著，趙殿紅譯：《清初耶穌會士魯日滿常熟賬本及靈修筆記研究》，鄭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第24頁。
89. [法]高龍肇著，周士良譯：《江南傳教史》，第2冊，卷3《楊光先發動教難》，第5章，《各省的教難》，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33頁。
90. ARSI, JS 112, f° 155r. 轉自[比]高華士著，趙殿紅譯：《清初耶穌會士魯日滿常熟賬本及靈修筆記研究》，鄭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第155頁。
91. [比]高華士著，趙殿紅譯：《清初耶穌會士魯日滿常熟賬本及靈修筆記研究》，鄭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第155頁。
92. [法]費賴之著，梅乘騏、梅乘駿譯：《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1552-1773）》，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啓社，1997年，第380頁。
93. [法]費賴之著，梅乘騏、梅乘駿譯：《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1552-1773）》，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啓社，1997年，第380頁。
94. [清]高士鷄等修：《（康熙）常熟縣志》，卷10，《官師表》，清康熙二十六年刻本，第64頁；康熙三年（1664年）至康熙七年（1668年）的常熟知縣為李璞，字漱岩，四川閬中人。
95. [法]費賴之著，梅乘騏、梅乘駿譯：《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1552-1773）》，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啓社，1997年，第381頁。

96. ARSI, JS 124, f° 73r. 轉自 [比] 高華士著, 趙殿紅譯: 《清初耶穌會士魯日滿常熟賬本及靈修筆記研究》, 鄭州: 大象出版社, 2007年, 第329頁。
97. ARSI, JS 162, f° 349v. 轉自 [比] 高華士著, 趙殿紅譯: 《清初耶穌會士魯日滿常熟賬本及靈修筆記研究》, 鄭州: 大象出版社, 2007年, 第181頁。
98. [法] 費賴之著, 馮承鈞譯: 《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 北京: 中華書局, 1995年, 第337頁。
99. [法] 費賴之著, 馮承鈞譯: 《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 北京: 中華書局, 1995年, 第381頁。
100. [比] 高華士著, 趙殿紅譯: 《清初耶穌會士魯日滿常熟賬本及靈修筆記研究》, 鄭州: 大象出版社, 2007年, 第321頁。
101. ARSI, JS 117, f° 211v. 轉自 [比] 高華士著, 趙殿紅譯: 《清初耶穌會士魯日滿常熟賬本及靈修筆記研究》, 鄭州: 大象出版社, 2007年, 第156頁。
102. ARSI, JS 116, f° 240. 轉自 [比] 高華士著, 趙殿紅譯: 《清初耶穌會士魯日滿常熟賬本及靈修筆記研究》, 鄭州: 大象出版社, 2007年, 第267頁。
103. [比] 高華士著, 趙殿紅譯: 《清初耶穌會士魯日滿常熟賬本及靈修筆記研究》, 鄭州: 大象出版社, 2007年, 第326頁。
104. [法] 費賴之著, 馮承鈞譯: 《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 北京: 中華書局, 1995年, 第338頁。
105. [法] 費賴之著, 梅乘騏、梅乘駿譯: 《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 (1552-1773)》, 上海: 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啓社, 1997年, 第381-382頁。
106. [比] 高華士著, 趙殿紅譯: 《清初耶穌會士魯日滿常熟賬本及靈修筆記研究》, 鄭州: 大象出版社, 2007年, 第277頁。
107. [法] 費賴之著, 馮承鈞譯: 《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 北京: 中華書局, 1995年, 第338頁。
108. [比] 鍾鳴旦等編: 《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 第12冊, 《泰西殷覺斯先生行略》, 台北: 台北利氏學社, 2009年, 第599頁。
109. [比] 鍾鳴旦等編: 《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 第12冊, 《泰西殷覺斯先生行略》, 台北: 台北利氏學社, 2009年, 第600頁。
110. [法] 費賴之著, 馮承鈞譯: 《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 北京: 中華書局, 1995年, 第327頁。
111. C. R. Boxer, Some Sino-European Xylographic Works, 1662-1718, i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47, pp. 199-202.
112. [法] 費賴之著, 馮承鈞譯: 《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 北京: 中華書局, 1995年, 第327-328頁。
113. David E. Mungello, *The Forgotten Christians of HongZhou*,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p. 45.
114. [法] 費賴之著, 馮承鈞譯: 《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 北京: 中華書局, 1995年, 第328頁。
115. David E. Mungello, *The Forgotten Christians of HongZhou*,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p. 47.
116. [德] 萊布尼茨著, 梅謙立等譯: 《中國近事: 為了照亮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 鄭州: 大象出版社, 2005年, 第22-24頁。
117. [比] 鍾鳴旦等編: 《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 第12冊, 《泰西殷覺斯先生行略》, 台北: 台北利氏學社, 2009年, 第604-605頁。
118. 方豪: 《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 上冊, 《楊廷筠傳》, 北京: 中華書局, 1988年, 第135頁。
119. [比] 鍾鳴旦等編: 《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 第1冊, 丁志麟: 《楊淇園先生超性事蹟》, 台北: 方濟出版社, 1996年, 第227頁。
120. 方豪: 《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 中冊, 《殷鐸澤傳》, 北京: 中華書局, 1988年, 第135頁。
121. [法] 費賴之著, 馮承鈞譯: 《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 北京: 中華書局, 1995年, 第427頁。
122. [比] 鍾鳴旦等編: 《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 第12冊, 《泰西殷覺斯先生行略》, 台北: 台北利氏學社, 2009年, 第605頁。
123. 1672年殷鐸澤返回歐洲時, 洪若翰曾與其接洽, 表達去中國傳教的意願。Lettre du P. de Fontaney au Révérend P. de la Chaise, à Tcheou-chan, le 15 de février 1703, *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Mémoire de la Chine, tome dix-septième*, Toulouse: chez Noël Etienne Sens & Auguste Gaude, 1810, p. 190.
124. [法] 費賴之著, 梅乘騏、梅乘駿譯: 《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 (1552-1773)》, 上海: 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啓社, 1997年, 第368頁。
125. [法] 費賴之著, 馮承鈞譯: 《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 北京: 中華書局, 1995年, 第427-428頁。
126. [清] 佚名, 韓琦、吳旻校註: 《熙朝定案》, 北京: 中華書局, 2006年, 第172頁。
127. [法] 費賴之著, 馮承鈞譯: 《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 北京: 中華書局, 1995年, 第329頁。
128. [比] 鍾鳴旦等編: 《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 第12冊, 《泰西殷覺斯先生行略》, 台北: 台北利氏學社, 2009年, 第606頁。
129. [比] 鍾鳴旦等編: 《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 第12冊, 《泰西殷覺斯先生行略》, 台北: 台北利氏學社, 2009年, 第606頁。
130. [清] 佚名, 韓琦、吳旻校註: 《熙朝定案》, 北京: 中華書局, 2006年, 第183頁。
131. [清] 佚名, 韓琦、吳旻校註: 《熙朝定案》, 北京: 中華書局, 2006年, 第180-185頁。
132. [清] 黃伯祿: 《正教奉褒》, 台北: 輔仁大學出版社中國天主教史籍匯編本, 2003年, 第552頁。